

晚学盲言

钱穆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学盲言 (下)

钱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 录

序	1
---------	---

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

一 整体与部分	3
二 抽象与具体	18
三 时间与空间	26
四 常与变	33
五 自然与人文	42
六 变与化	47
七 道与器	52
八 物世界与心世界	60
九 道与理	75
一〇 中庸与易简	83
一一 质世界与能世界	91
一二 人生之阴阳面	103
一三 灵魂与德性	112
一四 大生命与小生命	121
一五 天地与万物人生	130

中篇 政治社会人文之部

一六 国家与政府	141
一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	149

一八	政与学	156
一九	政党与选举	163
二〇	权与能	169
二一	国与天下	172
二二	政治与社会	176
二三	群居与独立	188
二四	群与孤	193
二五	中国家庭与民族文化	199
二六	中国文化中之五伦	205
二七	五伦之道	217
二八	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一伦	224
二九	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权	230
三〇	简与繁	235
三一	尊与亲	242
三二	色彩与线条	252
三三	礼与法	255
三四	教育与教化	261
三五	操作与休闲	268
三六	生命与机械	275
三七	共产主义与现代潮流	290
三八	道德与权力	295
三九	道义与功利	300
四〇	创业与垂统	309
四一	帝王与士人	316
四二	风气与潮流	321
四三	自然与人为	324
四四	组织与生发	330
四五	雅与俗	337

下篇 德性行为修养之部

四六	生与死	347
----	-----------	-----

四七	乐生与哀死	353
四八	性与命	361
四九	平常与特出	373
五〇	公私与通专	388
五一	公私与厚薄	391
五二	情与欲	395
五三	天地与心胸	400
五四	己与道	406
五五	心之信与修	414
五六	为己与为人	420
五七	性情与自然	432
五八	手段与目的	439
五九	传统与现代化	451
六〇	历史上之新与旧	465
六一	辨新旧与变化	471
六二	内与外	476
六三	安定与刺激	483
六四	器与识	487
六五	孟子论三圣人	490
六六	中与和	497
六七	人物与事业	500
六八	知识与德性	509
六九	学问与知识	515
七〇	知识与生命	522
七一	知与情	528
七二	修养与表现	533
七三	为政与修己	539
七四	进与退	547
七五	积极与消极	558
七六	存藏与表现	568
七七	人世与出世	576

七八	宗教与道德	582
七九	平等与自由	587
八〇	文与物	592
八一	静与减	598
八二	广与深	606
八三	多数与少数	613
八四	福与寿	626
八五	同异得失	632
八六	德与性	636
八七	尊与敬	639
八八	德行	643
八九	客观与主观	654
九〇	理想与存养	660

四六 生与死

生必有死，乃人生共同一大问题。世界各地人类对此问题具有甚深异见，姑扼要言之。埃及人认人死可复活，遂发明了木乃伊及金字塔。今日犹称其为古代之杰作，群相瞻仰，无可模仿。实则木乃伊终未复活。此则当时聪明绝顶之发明，乃从至愚极蠢之想法来，此亦人类一莫大讽刺。至今人类已不建金字塔，不造木乃伊，然从至愚极蠢之想法中，产出聪明绝顶之发明，其例尚多，则诚大堪警惕。

耶稣上十字架，自言将复活。至今耶教中复活节仍为一大典礼。试问果谁见耶稣之复活？纵使耶稣复活，亦非尽人之死皆得复活。然则此一举世风行之绝大典礼，亦从一至愚极蠢之想法来。人生同有此希望，虽至愚极蠢，仍得流传。可知凡属流传，非尽可信。

至耶教之一般信仰，分人生为两截。一为生前尘世，则属凯撒世界。一为死后天堂，则为上帝与耶稣之世界。故生前则争财争权，求富求贵，唯凯撒之是瞻。死后则求恕求赎，悔罪悔恶，唯耶稣之是依。兼顾并及，斯为耶教民族共由之大道。但耶稣所管与凯撒所管，又何得会通而合一，此诚人类莫大一问题。

释迦既怕死亦畏生，求得不死，莫如无生。于是生老病死遂视为人类四大痛苦。佛教不信灵魂，却认有前世之业，六道轮回，投胎转世，痛苦无竭。唯信佛法，消除业障，成大涅槃，得大解脱，到时则无人类生存。此与耶教之有世界末日大意略同。唯世界末日乃上帝之惩恶，而涅槃境界则人类之自觉醒自修为所致。故其他宗教多尚神，而佛法则尚法尚己，最后则期求其己之绝灭，归于大空，此为佛法在各宗教中一大异之所在。

以上举其大者，其小者不详言。唯中国人对人类死生之想法则与各民族皆不同。中国人先分人生为两方面，一曰身生活，又一曰心生活。身生活属于气质，今称物质生活。心生活谓之德性，今称精神生活。中国人之灵魂观亦与其他各民族异。中国人分魂魄为二。魄属体，故曰体魄。人死骨肉埋于地下，魄亦随之。骨肉腐朽，魄亦随失。魂则不附体而游散，故曰魂气，亦曰神魂。后死者制为木主神位，使死者之魂有所依主，而藏之宗庙，岁时节令，以祭以拜。故古人祭在庙，不在墓。

死者之魂，亦与生者之心相通，乃得显其存在。逮及三世五世，死者之魂与生者之心已渐疏远隔绝，则宗庙中之神位亦移去。年代既久，斯神魂亦失其存在。

故中国人所重在生，不在死。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神在祭者之心中，祭乃祭者自尽其心。至于心外是否真有神，是否真能来受享，孔子似所不问。故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葬祭其死，可使生者德性归厚，厚死即所以厚生。不仅死者可以长留生者之心中，抑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者之体即从死者来，是死生身心实相通。即从物质躯体言，六尺之躯，百年之寿，此乃个人之小生命。上自父母，下及子孙，一线相承，大生命犹尚超其躯体小生命而存在。故中国人特重血统家族观念。一阴一阳，一昼一夜，同是一天。一死一生，一存一亡，同是一生命，即同是一人。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则我此小生命中断，父母祖宗之生命传统由我而中止，此为不孝之大。

身生活如此，心生活则犹有大于此者。人群之生，其心相通，不限于家族血统之一线。身之外有家，家之外有邻里乡党，以至于有国有天下。同此人生，心生活皆相通，成一大生命。此一生命则超血统，而成道统。身家国天下皆一统于道，一切有血统之小生命，皆在此道统之大生命中，此道上通于天。天之大德曰生，生从天来，能上通天德，则此生命可以旷天地亘古今而不绝。中庸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乃个人之小生命。父传子，子传孙，一如川流。圣人具大德，则如天之敦化，亦大生命之所赖以永存，其他各民族仅见川流之变动，不觉敦化之常存。或又必分川流与敦化以为二，不知其融合而为一，乃与中国人生观多别。

春秋时代，鲁国叔孙豹先于孔子，而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此为中国人对死生问题千古永传之名言。何以谓立德不朽，如舜之孝，至于周公，即不啻舜之复活。迄于后世，孝子辈出，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果使中国民族长在，中国文化不灭，则在中国社会上将永远有孝子出现。就孝子之肉体生命言，固各已消失。但就孝德及孝子之心言，则长留后代生命中不匮不朽，斯舜与周公乃及一切孝子之生命皆不朽。此乃小生命在大生命中之不朽。苟无大生命，则何来有小生命。就个人之小生命言，则皮肤骨肉之身生命必有死，而心情德性之心生命，则可永传无死。此乃中国人观念。

又如尧以天下让舜，舜以天下让禹，让之一德，亦永为中国后代重视。吴太伯三以天下让，周初有吴太伯，即犹尧、舜之复活。伯夷、叔齐之让国，让有大小，而同一让德，是伯夷、叔齐亦即尧、舜吴太伯之复活。孔子论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仁之为德，唯在心生活大生命中始见。重视个体小生命必有争，重视心生活大

生命则始有让。亦必重视心生活大生命乃始有孝。孝与让,德相通,皆孔子之所谓仁。仁即人类在大生命中之一心生活,故朱子释仁曰:“心之德,爱之理。”若就个体小生命言,则所爱唯此一身,而此身则必死而无存。西方人既重个体小生命,则必重此身之死,乃有宗教。然宗教爱上帝,非人与人相爱,故其不朽则必在灵魂之上天堂。中西双方观念不同,宜其思想行为之见于实际人生者多不同。

立德之次有立功。生为天之大德,亦即天之大功。耶稣钉死十字架上,教徒乃不许人世后有第二耶稣,是则耶稣在人世,仅有立功,未为能立德。人人不得为耶稣,以至世界末日之终必来临,此非上帝于人类以一大惩罚乎?即亚当夏娃,亦膺罪被谪而生。则与中国人观念天之大德曰生之涵义大相反。中国人意见,人类生生不绝,此即天地之大德。中西双方同戴一天,而其异则无可会通。耶稣为上帝独生子,而在中国则天降斯民,人皆可以为尧舜。此又何说以相通。释迦则主人自凭己力得大涅槃,天亦无如之何。此与中西双方又不同,唯与中国人观念较相近。佛教入中国,有禅宗,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人人现前当下一心之悟,皆得成佛。悟立信谢,悟在己不在佛,只凭己心,斯亦不再须有心外之佛法。

中国言立功,每指大禹之治水。禹父鲧,治水无功,殛死于羽山。禹继父业,终成父志,是即禹之大孝。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子生方呱呱,亦不一视。急公忘私,此见禹之为人之德。试读中国史,凡建功者莫不有德,背德则无功。亦有当其身若无功,而功传后世,亦其德使然。如岳武穆,朱仙镇召回,复国之功未见。文文山军败被俘,保国之功以败,两人皆不保其首领,而功垂万世。故立功皆以立德,专于事上求,则其功必浅,或竟无功。

又次为立言,亦必有德之言。言有德,斯有功。如叔孙豹言三不朽,即有德之言,其为功亦大矣。近日国人率讥中国乃一封建社会,然叔孙豹明言世禄非不朽,此绝非封建社会人观念。倘谓孔子亦封建社会人,但孔子为中国立言不朽之最高榜样,何尝教人常困缚在封建社会中。人生必能超社会,乃能超时代而不朽。今日国人方自负得为工商社会人,得为民主自由时代人,得为全盘西化人,鄙薄孔子。不知身死即朽,而孔子言则犹当垂世。一则囿于社会囿于时代,虽有此生,非有此德。一则上通于天,下通于群,有德方有言。则盈世之鄙薄,又何伤孔子之毫发。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将死,其囿方解,其德或露,故有善言。今日工商自由社会亦临将死之际,容有善言,如鸟哀鸣,则亦天地生人之大德,而人生乃亦终有其可望。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之德生于天,然亦成于其学。学以成

己,其悦如何。孔子又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门师生讲学,成己亦以成人,其为乐又如何。然天有不可知,人之生能上达天德,斯亦宜有不可知。就私人小生命言,人不我知,此亦可愠。就人之大生命言,则世代相传,后生可畏,岂知来者之不如今。言垂于世,有私淑艾者。孔子百年后出孟子,私淑艾于孔子。自此以来,两千年私淑艾于孔孟者,又何止千百人,斯皆孔孟之复活长生而不朽。亦有未闻其言而遥符其德者。均在大生命中,其德相符,亦即己之不朽,而又何知不知之辨,故人不知而不愠。

中国后世多以文章为立言,然亦必有德,其言始不朽。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到处可采,山到处可见,然渊明之采菊见山,乃有渊明之心之德之存在表现。诵此十字,而冥然有会,则渊明其人亦恍惚如在诵者之心中。此亦即渊明之不朽。陶渊明后有杜子美,皆以有德之言成其不朽。即如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己独酌,若觉有三人同欢,此亦太白一诗之心情与意境,亦即其心德之流露。诵其诗,想见其人,斯亦即太白之不朽。又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与李太白心情意境又异。一人忽若成三人,斯即不孤寂。举世忽若只一人,其孤寂之感又如何。然在此大生命中,必有会心之人。或前在古人,或后在来者。斯则子昂之不孤寂,乃更在太白一人独酌之上矣。此即子昂之不朽。故凡所不朽,皆在己心,而又何求于后世之不朽,此即其心之至德矣。

中国人重心生活,故其诗人亦多直吐胸臆,道其心事,自古诗三百首以来皆然。故曰:“诗言志。”心牵于事,即不成志。诸葛孔明澹泊明志,其心澹泊,即不牵于事。诗之外有文,战国时有乐毅报燕惠王书,有鲁仲连义不帝秦,皆千古至文,亦皆直道己志,不为事牵,乃卓然见其为人,即卓然见其居心。苟心随事转,心不为主而为奴,所谓心为形役,仅知有身生活,则生老病死四字足以尽之。鲁仲连曰“唯有蹈东海以死”。死者此身,非此心。孔明亦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者亦此身,其心报先帝以驰驱,亦驰驱此身。心则主宰此驰驱,此谓之志。志不惧死,既非苦痛,亦非空幻。中国人生之不朽,即不朽在大生命中,亦即在此方寸间之一心。故诵中国之诗文,而中国之人生亦宛然在目。西方人生与中国异,亦即观其文学而可知。今国人唯求西化,移西方心易己心。见中国古人心,厌恶之唯恐不远。读中国古诗文,谥之曰死文学。若就五千年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谁死谁不死,宜仍当有辨。

唯心生活则仍必寄托于身生活。不论其身之在廊庙,在市井,在田野,在山林,

处身有别，而心则可通。此相通处，即心之德。如人身耳目手足五官六脏各有所司，而通于一身。主宰此相通者即心。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行尸走肉，身又何贵。身在家，则求通一家之心。身在国与天下，则求通一国一天下之心。故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则以正心诚意致知为本，此心此意此知，则又必外见于物。大学八纲领首格物。不论在农村社会封建社会工商自由社会，物各不同，必当随物而格。此格字，即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矩字。即在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姊妹乃至夫妇，此心皆有爱，而所爱有分寸之不同。贵合格，不贵过格与不及格。则大学之格物即孔子之中道。一家然，一国一天下亦然。大生命一气相通，而有理存其间。故朱子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德在心在内，理在物在外。故朱子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达。”心物一，即内外一，天人一。亦即我之大生命所在。

大学三纲领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此心。此心即人类之大生命。故明明德则必亲民。即在犬马，亦非终日蹄啮吞噬之为生。程子曰：“观雏鸡可以知仁。”雏鸡之相处，与其母，亦有相亲相安之状，亦即其心其德，其仁其善。即此亦是大自然中一表现。倘悖德违仁而徒务外在之功言，则为祸为害之烈，乃别有其不朽。故中国儒家孔孟以来，即少言叔孙之三不朽，即防其德、功、言三者之皆化而外在，失其中心内在之一德。今则人生进步，乃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相争相杀。徒慕其经济之财力，与其武装之强力，而曰唯我个人之自由。此吾国人今日之所心慕。而西方人则尚存一身后天堂可资归宿，否则又何至善之可止。幸吾国人其三思之。

抑中国古人言，凡有生必同有此身此心此德，此心此德皆禀赋之于天。此不专为中国人言，乃同为天下人言。故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先得此心此德之同，乃同为中国之大圣。孔子欲居九夷，或曰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释迦、耶稣亦夷狄之人，其道来中国，中国人同以圣人视之。但孔子之与释迦、耶稣，其果孰为圣人之正乎，于何正之，亦正之于我国人之心之德之同。今日吾国人既不以孔子为正，又不以释迦、耶稣为正，乃一正之于银行中之美钞，武装库之原子弹。而反之于心，终有未安。举世之乱，乃由此起。故中国古人之所言，依然可证验之于当世。今日吾国人之所非未必非，所是未必是，亦唯有曰“明明德以亲民，以止于至善”而已。

人生有死，此乃人类唯一大事，即释迦、耶稣、孔子所欲格之唯一重要之物。但

三家对此所知各有不同,然三家之所从格,则同由诚意、正心来。今日世人所知曰美钞,曰原子弹。赖美钞以为生,是曰贪生。遭原子弹而死,则为枉死。于贪生中求免枉死,今日人类生死问题则此一语足以尽之。但今日美钞之主要任务则为制造原子弹。是不啻以贪生为捷径,以枉死为归宿。此诚一种至愚极蠢之想法。而美钞之与原子弹,则终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聪明绝顶之发明。唯与中国人之所谓格物而致知,则有其不同而已。

果如孔子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芸芸众生中,宁不再有释迦耶稣孔子之复生。是则非有世界末日,即为大涅槃,否则为天下太平。此三境界之展开,终为人生必有之三结局。美钞之与原子弹,则皆产生于耶教世界中,是耶稣之人生原始罪恶论,亦信而有征矣。若果世界末日来临,或亦可谓其犹近似于释迦所想望之一大涅槃。唯吾中华子孙则沾溉于孔子之教言以为生者,亦积两千五百年之久,天下太平,终非世界末日。此则当警惕者,亦终以吾中华子孙为尤然矣。

若使孔子而生今日,诵李太白诗,方其月夜独酌,岂不有释迦、耶稣两影可以伴饮。孔子而时代化,是亦可陶然而醉矣。若诵陈子昂诗,则知我者天,亦可怆然而涕下。然而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则吾心之怆然亦从心之所欲而已。其与良夜之独酌复何异哉。是则孔子生今日,亦必诵太白、子昂之诗,是亦终不失为一中国之人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今日吾国人亦多乘桴而浮海,此亦皆可为今日之孔子,其亦终将有契于孔子之所言乎。企予望之,企予望之。

四七 乐生与哀死

(一)

乐生哀死,为人生两大事。西方社会信有灵魂,生前死后与现此生世各不同。如生世为一家,父母子女,生前不如此,死后亦不如此。故孝父母仅当生现世之事。抑且家人集居,同财不同权,故西方有母权父权之分。父母死,即无权,子女得自由,对死父母自亦少哀思。其灵魂上天堂,又何哀。其灵魂下地狱,必其生世有罪孽,亦不足哀。

故西方人在生世,仅知对生求乐,不知对死有哀。其历史人物能对后人留哀思者亦极少。如古代亚力山大、凯撒,近世如拿破仑,生掌大权,来自武力,死后仅供景慕,不留人以哀思。其他军事家政治家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各界诸伟人,当生享名获利,受其所业之报酬,死后亦留有景慕,无哀思。埃及古帝皇,死后有金字塔。巴黎有凯旋门。美国华盛顿市,华盛顿大铜像矗立。雅典、罗马以及其他各处,古迹森然,皆增景慕,非存哀思。要之,西方社会可称乃一无可哀思之社会。其唯一可供人哀思者,唯耶稣。但耶稣乃犹太人,其十字架精神诚堪哀思。进教堂听颂祷诗,亦多哀思声。教中人物如圣女贞德之类,亦可生哀思,然为数甚仅。西方乃一个人主义之社会,人与人间唯有争,对人之死,宜无可哀,亦无足深怪矣。

中国则大不然。中国人生仅自然大生命中一现象一枝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生即从父母来,父母之死不啻若己身之死。如是则父母之生,已变而为己身之生。故曰节哀顺变,则其哀亦可知。故中国古代家宅其西偏为生人所居,东偏为死者神位所藏。岁时祭祀,即在家中。后世农村多聚族而居,亦必有祠堂,即在村中。岁时礼拜,哀死亦即所以乐生。

诗有风、雅、颂,颂专以致哀死,而最为礼之大者。周人尊文王,又尊后稷,岁首必祭,天下诸侯皆集。清庙之歌,一颂而三叹,庄严肃穆,大小雅迥不能及。然则哀

死岂不犹远在乐生之上。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后人遂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人唯有情，方其未发，藏于内，故曰中。其存藏于中者，仅此一情，非有七也。及其受外面事物刺激而发，其状异，遂目之曰哀乐。然哀乐非有二情。其发而中节，不失其分寸，则当曰和。不仅与外面事物和，其藏于内者，亦仍一和，非有哀与乐之分别。父母在堂，寿登耄耋，孝子不胜其情，既歌且舞，人目其情曰乐。及其父母死亡，孝子不胜其情，既泣且踊，人目其情曰哀。孝子内心非有二情，但其发而有异。乃是此孝子之心与父母和合为一，故其情亦与父母之寿考与死亡之异和合为一。故情藏于中，因于外而发，贵其能内外相和合，斯曰中节。哀乐如此，喜怒亦然。独怒之发，每易与外不相和合。然武王一怒而天下平，则怒亦一和。苟能中节，则怒亦如喜，非有相异。中国古人言，发乎情，止乎礼，礼即其节。又曰：“礼之用，和为贵。”人生无情，则又何礼何和之有。

人之生命唯一情，生则乐，死则哀。顺于生则喜，逆于生则怒。生所需则爱，生所厌则恶。此皆生命自身内部一自然动向，即谓之欲。如饥欲食，与之食则喜，夺之食则怒。遇食则乐，失食则哀。可食则爱，不可食则恶。使无欲食之心，则上之六情皆不见。此欲食之心与生俱来，谓之性。性则在内未发，发而向外则曰欲。生命对外，复杂多端，变化无穷，乃有可欲有不可欲。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即言其与生俱来。“率性之谓道”，即本乎性而发于外，一切人生皆即道。“修道之谓教”，则道亦须修。如饥欲食，但食不能不择，又不能无节，又须食而知味。仅知饮食，则为一事，可谓不知道。

中国乃一农耕人生，日与生命相处，种植耕耘，日夜勤劳，唯以养育生命为事。与畜牧不同。畜牧则大群牛羊，任其自为生长。稻麦五谷，则由农人助之生长。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实则此心之不忘，即在助之长。孟子之所谓助，则谓不中节之助。故农业民族乃特与生命有情，熟知各种生命内部自生自长之真情，而从外助其长。中国文化之最高可珍贵处即在此。

中国人哀死之情，成为一种礼俗，普遍全社会，其事至明显，其义至深厚。如端午节祀屈原。屈原特一楚国人，忠君爱国，而赍志以殁，未有勋绩成就，乃获得此下全中国人之哀思，历久而不衰。即论文学，离骚非人人能读，远非如西方创造一剧本一小说可以广泛流传之比。而屈原身后，能获得全中国人广大深厚悠久之同情与哀思，则全世界各民族之文学家，亦绝少有之。可见此不当专以文学论，而当以文化论。近日国人认为文学可以获人心，则不免为一种偏浅之薄识。

如春秋时代晋人介之推,从公子重耳出亡。重耳返国为晋文公,行赏未及,之推偕母遁隐山中。文公求之,终不出。至焚山搜索,而母子俱死。遂有寒食节,亦迄今不衰。论其人,无事业功绩可言。而守志以死,引发国人之哀思。又如东汉初严光,乃光武一同学,避不出仕。光武访得之,终辞归。而严滩古迹,两千年来遭人凭吊思念不已。严光高德,固不可及,而中国人之深情,亦由此而见。近人好言中国为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上述屈原、介之推、严光三人,其高节卓然,历两千年,国人思念之不已,岂亦帝王专制社会封建强令之然。而此三人之人生,其为可乐抑可哀,又岂今人之言哀乐者之所能评定。

以上不过于天时节令地理名胜上偶举此三人言之,其他不能一一详及。春秋时代有息夫人。楚灭息,楚王纳之,息夫人三年不言,名载左传,为后世所称道。今试问左传二百四十年列国之治乱兴亡君卿大夫贤奸昏明有关世运之大者,千端万绪,长篇巨幅所不能尽。息夫人特一亡国之嫠,既不能以死守节,其与当时国际大局又何斡旋,又何建白。而楚王之宠受,终亦未转移其内心之深痛。三年不言,斯诚竭人世之至可哀悯,而时人能与之以同情,传之后世。此乃中国人道一大节目,治国平天下一大纲领所在。岂有人与人无同情,而此生可乐,此群可安之理。读史者不深明乎此,又何从与言中国之文化。

若循此以诵中国一部二十五史,以及古今各家诗文集所咏所载,旁及地方志乘小说笔记中所述,其人其事,何限何尽。即如汉末有蔡文姬,弃其异国之夫与其子女,不顾其为一国后妃之尊,而决心归汉。途中有胡笳十八拍,其诗岂不亦传诵千载。归国后之晚年生活,亦未见传述。要之,其无关世运,无所影响于当代之治乱,而其孤独一人之凄凉身世,则为尽人所同情。蔡文姬之名字及其作品,遂亦永传于后世。观于息夫人与蔡文姬,死可哀,而生亦有可哀。但生可乐,死亦有可乐。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山,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仁取义,岂不可乐。秦桧死岳飞于狱中,瞻拜西湖岳飞墓,岂不岳飞死可乐,而秦桧生可哀。死生一体,哀乐一情,此当体之生命深处。而岂言辞之分别所能尽。

故在中国,史学文学,一皆取材于真人真事。而衡量取舍之标准,则不凭于权位财富,亦不专限于功业成就。品德修养,乃为中国人之最所重视。但悬格亦不严。苟有一节可取,尤其遭世不淑,受人所难受,则悲天悯人之情,乃于是乎发之。韩愈有言:“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乃史家之职责。而集部中所见之潜德幽光,则盈幅皆是。故中国乃有最富人情味之人生,同情心到处充沛洋溢。苟其

专为一己，则乃私欲，为中国人所不齿。欲亦本于性，而可以害性。发为情，亦可以害情。中国人贵性情中人，而深戒多欲。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周濂溪言：“主静立人极，静者无欲之谓。”寡欲无欲，非寡情无情。情欲之辨，一对人，一对物，乃为中国后代论人生最大一问题。

争权夺位，谋财求富，皆欲非情。西方唯以财富权利为尚，全部历史活动以此为中心。其文学则多出虚构。好言恋爱，孝弟忠信人情之大者，甚少涉及。哲学则更讳言情感，一若人情皆无当于真理。故言政治，无论君主民主，言社会，无论为封建为资本主义，同属无情。法律之最高境界，则仅可免于过分之不义，而无仁。此为中西人生一最大相异处。

余于民国三十四年间，初看西方电影，尚系默片，片名已忘。其事迹依稀犹在记忆中。一德国中年人，忠恳诚实，成家立业，有社会地位。因事远行，火车中邂逅一女，钟情为偶，伪造死讯不归，其家人信之。历年后，女忽死，其人潦倒念家，出门漫游。一夕，偶抵家门，适逢其生辰，家中妻儿正广邀亲朋饮宴纪念。宾散，家人犹聚谈，灯火辉煌。此人终不叩门直入，仅窗外窥视，黯然离去。剧情生动，乐生必哀死，哀死即所以乐生。果使此老人叩门直入，哀乐之情又当如何。往事荒唐，老人内心之羞耻，家人意外之惊诧，皆非日常人情所有。咄嗟间，又何得相安相乐，一如往年。老人离去，则终以保全其一家之和乐。而此老人亦犹得常念其家人以为乐。此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此片亦甚富人情味，但荒唐终非不幸。不幸由命乃在外，荒唐失德则在己。中国人同情不幸，不幸事遂亦因而减少。果遭不幸，亦得自宽自慰，而轻其不幸之感。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则贵乎其慎修己心善自为处。则人生主要仍在此一情字上。

余以十三岁幼年，初读西方小说天方夜谭，迄今八十年，尚所记忆者，乃其最后能言鸟一故事。此鸟在一山上，山下有人指示，循路而上，寻求不难。然当一意直前，路旁群石竟发人声，呼之喝之，苟一回顾，即亦化石倒毙。路益上，石益多，声益大，终使人不易不回顾。某家三兄弟，其两兄皆已一去不返。最后一弟，乃塞两耳上路，终得此鸟而返。路旁诸石亦尽得复化为人。此乃一阿拉伯神话，后乃知其影响西方实亦多。西方人皆一意向前，虽经失败，而目的在望，仍不回顾。西方宗教哲学乃至文学科学，皆不啻为人指示一能言鸟所在地，教人信从，决心向前。已往之失败，既无同情，亦不回顾。如中国人，尊崇古人，同情不幸，则唯为路旁之石，又乌能终得此鸟。西方文化之向前迈进，岂不如此。

现代人称中国社会多人情味。其实味犹情，甜酸苦辣咸实一味，犹之喜怒哀乐实一情。物必食之始知味，人必相交而有情。物与人在外，味与情在内。内外和合，而情味生。唯所食异则味异，所交异则情异。能于异中知其同，乃为知情知味。饮食所以解饥渴，然当有余味留在舌根，存在心头，始为乐事。苟事过境迁，饮食下咽，更无留存，是为寡情，亦成乏味。孔子曰：“饭疏食，饮水，乐亦在其中矣。”又曰：“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谓人生于饮食外，尚有他乐，更深更厚。若仅知饮食之为乐，则孟子所谓乃饮食之人。然孟子以易牙比之师旷子都，则饮食之乐，圣贤亦不讳言。中庸言：“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亦犹谓人鲜不有生，乃不知生之宜有情。无情求乐，亦犹不知味而求饱，则仅求为一饮食之人而不如矣。

余家在江南鱼米之乡，干饭稀粥已不知有几多作法。自冬至至岁尾，农家种种糕团，亦不记有几多名目。鱼虾果蔬，俯仰即是，若可一拾而得。又家家户户各种腌菜腊味，多者可有二三十色。孔子曰，“贫而乐”。饮食知味，最普通，最基本，亦最易得。然亦经两三千年文化积累，乃有此成绩，非偶然而致。

又余家曾住北平，佣一车夫，擅制面食，品类多种。余常至灶间赏其技。对日抗战时，余又历各地，皆有特制饮食，价廉而味美，易得而难尽，此亦即中国贫者之乐。今人皆必谓西方物质文明远胜中国，但中国之庖厨烹调，能在物质中深藏人文精神，西方饮膳乌能相比。姑举茶与咖啡一项言之。咖啡味浓刺激，多饮易厌，茶味涵泳，自唐迄今实历千几百年之演变。亦如西方都市味浓少变，居久易生厌。中国乡村味淡多变，久居而安，不易厌。故品茶乃知茶味，品人则知人情。而人之高下亦以别。财富权力唯有争，唯有斗，无能品。今日国人亦尽尚争，不知品。回念数十年前，穷村三餐较之今日市肆之一席千金，其为味或有过之。然年老知味者，则亦与日俱逝。既无老成人，亦少典型，渺不再得，世运堪嗟乃如此。

中国人言声必及韵，言色必及采。此犹食之有味，生之有情，皆在质体之外，有余不尽。而其感动影响，留在人心，则唯深唯厚。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非孔子不信有死有鬼。苟无生，何来死。苟无人，何来鬼。声色而无韵采，声色倏去，复何可乐。然使无声色，亦无韵采可求。生可知，死不可知。闻声乃知韵，知生斯知死。中国人又言风采风韵风味风情。风亦非质体，而在人心和通相互感动影响之间。孔子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其实风起于青苹之末，果无草动，何来风生。然而今世之抱物质主义以为生者，此皆知有